



儒学与中国大学精神

(2005-6-28 15:38:24)

作者：郭齐家 储朝晖

上述过程是一个文化创新过程，或孔子所说的“损益”过程，郑国子产提出“天道远，人道迩”，孔子更“转入了‘人道’领域”，以至“春秋以来，中国文化已日益明显地有从天道转向人道的倾向。”从孔子“从周”，到范仲淹“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被朱熹、欧阳修、蔡元培等众多后世士人反复认同与解读，并不断生成新的士人精神，到蔡元培对中国古代“士”的价值与德国大学理念的认同，都是以儒学作为初始条件。

中国学术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对“士”给出质性、典型的规定：

笃信善学，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邦有道贫且贱焉，耻也；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

士而怀居，不足为士矣。

君子谋道不谋食。耕也，馁在其中矣；学也，禄在其中矣。君子忧道不忧贫。

天下有道，以道殉身；天下无道，以身殉道。未闻道殉乎人者也。

儒家经典《周易·乾卦·象传》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”，两句话合起来形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，也为中国大学精神提供了数千年后仍难以超越的精神范畴。

其三、儒学是中国大学精神形态与内容的内核

德治为中国大学精神的早期形态，它起于周公，在内质、功能和形式三个方面承袭、发展了“孝”，并通过“礼”来约束规范人的行为，治理国家。中国古代社会中的“德”“祖先本源于天，而天本身是有德性的。天之德就是化生万物的洪恩”。不仅《易·系辞下》有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，而且后来董仲舒宣扬“天道施，地道化，人道义”，将天与祖先合而为一加以崇拜，形成以德配天德的观念。《中庸》更道“仲尼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；上律天时，下袭水土。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……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，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。唯天下至圣……凡有血气者，莫不尊亲，故曰配天”。

由于存在这种“德治”精神的根基，加之“独尊儒术”政策的施行，后来“在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影响下，中国传统教育在目的论、课程观和方法论方面都体现出浓厚的伦理与价值色彩，形成了崇圣贤经、重道轻艺，以反映人文知识体系的经学教育为本，以反映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专业知识为辅的教育传统。”

第一部论述到中国大学精神的著作《大学》主要体现的为儒家思想，儒家首先提出了“大学之道”的论题，这里的“道”是“形而上的”“理念”、“根本”即“大学精神”。《大学》秉承“德治”精神，开篇即道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”。然后通过：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等八个步骤环环相扣地实现其德治的精神追求，形成十分严密的贯彻德治之大学精神的系统。《大学》所追求的“至善”境界“即为人君，止于仁；为人臣，止于敬；为人子，止于孝；为人父，止于慈；与人交，止于信”的“士君子”。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言：“《大学》所呈现的是步步扩展，层层深入的一种修身哲学。……《大学》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是一个逐渐向外扩展的同心圆，这个同心圆的外圆应该是开放的；从个人到家庭、到社会、到国家、到世界，乃至到人类的群体、宇宙，它是向外扩展的；同时，它层层深入，由我们的心知，到我们的灵感，再到我们的神明……这一思想体系，不仅在中国，而且后来在东亚，现在在世界上也受到大家的重视。”在《大学》所确立的大学问（大学精神）的价值取向影响下，古今已产生过众多形态各异的大学形体。

《大学》所确立的大学价值取向构成了中国古代大学精神的初始典范，孔子则以身作则体现这种精神，他“‘发奋忘食，乐以忘忧’的积极奋发的人生态度；‘朝闻道，夕死可也’，视追求真理高于一切的精神；‘仁以为己任’的社会义务感；‘杀身成仁’，‘守死善道’的理想人格；以及基于协调社会群体关系而提出的诸如‘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’，‘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’等行为准则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等等，对我国民族的精神文化和民族性格的一些特点的形成，确实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”。这种示范对中国历代学人的精神追求产生了更为集中深远的影响。孟子和荀

子以各自的特色赓续了孔子的精神：孟子的大学精神体现在反求诸己、“乐以天下，忧以天下”，把学问当成“公器”而非“私器”，“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”，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，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”，“以其昭昭，使人昭昭”。荀子曾三为“稷下学宫”的“祭酒”，“最为老师”，其精神集中反映在《劝学》、《修身》、《不苟》、《解蔽》等著作中，可简要地归纳为：“学不可以已”、“锲而不舍”、立“冥冥之志”、“穷无穷、逐无极”、“笃志而体”、“垒土不辍”、“至德、至诚”、“虚壹而静”，正是这种精神使荀子成为先秦儒学大师。

孔子创建的儒家大学精神境界“并没有绝对的排斥物质生活”，“但使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在不可兼得的时候，孔子一定偏重精神方面”，他的理想境界是实行“仁政”、“德政”来改变他所生活的时代“天下无道”的局面，他常用“智仁勇”来概括他所设计出的“君子”的精神境界，“智”的最高点是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的“道”，其“大学之道”便是由这种普适的“道”派生出来的；“仁”分“忠”、“恕”二境，终于“志士仁人”；他的“勇”则是严格限定在“智”、“仁”、“义”的统摄之下。“仁”与“礼”构成孔子大学精神境界的两条边界，“仁”于其内，“礼”于其外。

其四、儒学是中国大学之道的逻辑支撑

儒家注重“人道”，假定人道即是天道，“仁义为儒家之道，故志于仁义即志于道”。这种观念作为中国大学精神的一个重要内核延续了两千余年。

“中国的‘道’源于古代的礼乐传统……是一个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”。“在孔子以前，‘道’的观念大体上是指‘天道’，即以天道的变化来说明人事的吉凶祸福。”春秋以降，《老子》、《论语》将“道”抽象化。儒家当中，孔子之“仁”、孟子之“义”、荀子之“礼义”、韩愈之“道”、柳宗元之“生人之道”、朱熹等众多理学家之“理”都是“道”，孔子说“君子道者三，我无能焉。仁者不忧，智者不惑，勇者不惧”；道家当中，“按老子的话讲，‘道’是一种‘视之不见’、‘听之不闻’、‘搏之不得’的‘先天地生’、‘惚兮恍兮’、‘寂兮寥兮’、‘不可名状’的精神实体”，

所谓中国大学精神即古人所言的“大学之道”，即是“士志于道”的精神。“‘士志于道’——这是孔子最早为‘士’所立下的规定”，诸子百家中也大都认同这一规定。“整体地看，‘士’在中国史上确实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度连续性的传统”；另一方面，“无论是从思想基调或活动方式看，‘士’在这两千多年中都是迁流不居的”。“士”的基本特点可归纳为：一是他们的主要构成条件“在其所代表的具有普遍性的‘道’”；二是他们所志的“道”“是一个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”（在道家、墨家还内含天道）；三是“相信‘道’比‘势’更尊”，并将以“道”来批评政治社会当成自己的“分内之事”，或称“言责”；四是以自我内心的不断修养即“做人”“来尊显他们所代表的‘道’”。“士”虽千差万别，其以“道”为任则一。

在“士”与“道”之间起粘连作用的是“志”，孔子倡导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，“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。”曾参道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”孟子更详尽的论述了无论进退、穷达、得势与否“士”与“道”都必须合一，“儒家终生以‘道’为志”，全仗“无恒产而有恒心”的“士”来维护道。对此金岳霖先生有一段经典的论述：

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。其所以如此，因为道德、政治、反思的思想、知识都统一于一个哲学家之身；知识和德性在他身上统一而不可分。他的哲学需要他生活于其中；他自己以身载道。遵守他的哲学信念而生活，这是他的哲学组成部分。他所做的事就是修养自己，连续地、一贯地保持无私无我的纯粹经验，使他能够与宇宙合一。

“士”相信“自古有不亡之道，而无有不死之人”，这就是依据儒学逻辑所确立的中国古代大学精神的基本内容与结构。由于“道”的内多样性、普遍性、持续性，中国历代学人则必须具有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的精神，必须具有“观乎天文以察时变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”的能力，“孔颜乐处”、“人文化成”、“明人伦”、“明明德”、“亲民”、“止于至善”成为他们志于道的人生旅程中的一个个台阶。

三、儒学是中国大学精神变迁的主轴

秦代试图建立对某一派学术的独尊，这一目标在秦代没有实现，到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现了，并对中国大学精神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汉代中国大学精神最为深刻的变化即由“独尊儒术”所引发。董仲舒在《举贤良对策》中倡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“独尊”是儒学成为中国大学精神变迁之轴的起始。

董仲舒的“天人三策”对中国大学精神的第一大影响在于他倡导“开太学”，“使西周以后衰败四百年之久的中央官学，又得以复兴”；同时使原先多元取向的大学精神归一到“养士”、“化民成性”、“明义正道”上来。作为“独尊”的一项措施，汉武帝开太学“养士”。“养士之大者，莫大乎太学。太学者，贤士之所关也，教化之本原也”，“兴太学，置明师，以养天下之士”，规定“习儒典”，即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，太学教师

通称“五经博士”，诠释和传播以儒学为主的汉学（经学）成为他们的职责，从而形成了取向比较集中、获得优势发展的学术。

[\[第 1 页\]](#)

[\[第 2 页\]](#)

[\[第 3 页\]](#)

[\[第 4 页\]](#)

[\[关闭窗口\]](#)